

中国史通论

【上】

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

〔日〕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选编并监译

夏应元 刘文柱 徐世虹 郑显文 徐建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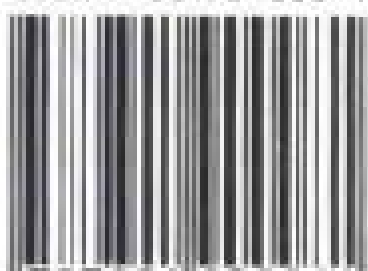


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南藤润南

ISBN 7-80190-008-1



9 787801 900081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90-008-1/K·004

定价： 49.00元(上、下册)

中国史通论（上）

——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

〔日〕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选编并监译

上册译者：夏应元、刘文柱、徐世虹
郑显文、徐建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史学”的创始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内藤湖南自幼随父学习汉学,引发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并走上研究中国历史的治学道路。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曾多次访华,与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等著名学者交往并搜集中国史资料,深入研究。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评价非常高,指出:“东洋(东方)史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主张必须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来观察大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考虑”,以此来确定分期。本书较全面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

内藤湖南先生的著作写于七八十年前,通过近几十年来我国史学界的努力,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回顾外国著名史学家当年的主要论点,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会有很多启发,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故此,我们出版的中译本保持了作者论述的原貌,敬希专家和读者理解。

编者前言

内藤湖南先生（1866～1934）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中国史学的开创与奠基时期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开创性建树，至今仍为日本中国史学界所广泛承袭，对日本甚至国外的中国史学都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年生于今秋田县鹿角市十和田毛马内。因该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在江户时代，该地虽远离江户、京都，但因该地是南部藩的重臣樱庭氏的领地，湖南的祖父、父亲都是世代仕于樱庭家的儒学者。由于家庭熏陶，他自幼随父亲学习汉学，打下汉学根基，对他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并最终走上中国史学家的道路，关系甚大。

及长，入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1887年（22岁）去东京，在近二十年间先后从事各杂志的编辑工作，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颇有才名。1890年，曾加入“政教社”。该社宗旨为反对当时明治政府推行的欧化主义路线，主张恢弘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以贡献于世界文化之林。这一思想结构，对于形成他后来学术活动的出发点，颇有影响。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湖南以在野的文人，日

益关心中国问题。他利用多次访华机会，用心搜集中国历史资料，努力从事中国史的研究。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当时京都大学学长狩野亨吉邀他去京大任教。湖南欣赏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等在野的朴学之士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之风，他认为京大与己之爱好相合，遂欣然应聘。但以他非帝国大学出身，暂以讲师应聘，担任东洋史学讲座。1909年晋升为教授。从此时起直至1926年退休时止，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经常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等课程，多次发表有关中国历史的演讲及论文。1926年被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相当于院士），标志着在日本学术界的权威地位。1926年退休后，隐居于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恭仁山庄，郭沫若等中国文人曾去拜访。1934年因病逝世。

综合他一生在中国史学方面的贡献，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在1899~1910年，曾六次来中国考察。他虽系受《大阪朝日新闻》、外务省等单位派遣，考察中国形势，但他却趁机得与中国文人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并潜心搜集中国资料，他喜获或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在1907年任职于京都大学之后，仍数次来中国调查敦煌文书、《汉文旧档》、《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秘籍，并努力搜集甲骨文、金文、中国金石及古器物等，对日本中国史学的史料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他对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各断代专题，例如上古史、清史，“满蒙史”等方面用力最深，不仅在京大讲学、还发表论文及演讲多次，颇有建树。

三、内藤在中国史学的最大建树，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

(一) 他的基本理论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本身即是各时代文化的发展。而他之所谓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即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各时代依据这些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势，显示出其阶段性，从而成为划分时代的依据。

(二) 他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自成体系，循序渐进、独立发展，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其历史展开，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体系。他反对欧美及部分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停滞论及各种贬低中国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曾成为东亚世界的主轴，强烈影响及于周围国家，首先是朝鲜及日本。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日本文化，完全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因而他有中日文化同一论的观点。

(三)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有其文化中心，而这一中心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移动。例如，从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周围其他民族地区扩散。周围民族受此影响，文化上“自觉”后，再反过来向中原地区施加影响。文化中心不仅可以在国内移动，还可能超出国界，向邻国（如朝鲜、日本）转移。文化中心不仅有地域上的转移，也可能在社会阶层中转移。例如，他认为，清代文化中心原在士大夫阶层，后来转移到下面的商人，将来也可能转移至工人、农民。

(四) 在社会各阶层中，他又特别重视平民的地位。他在中国史分期中，特别提出唐宋变革说。因为他认为，中国自宋代起进入近世，即进入君主独裁政治时期，而从此时起平民地位有所抬头，支持君主独裁政治，因而又逐步培育起民众力量。而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必然走上共和制的前途。

四、内藤在上述基本历史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把中国史

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的分期理论。在此之前，虽有中国史学家使用上述名词进行分期，但只是偏重从时间观念上使用它，而内藤则按每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及时代特点来使用它，赋予时代的内容，以此建立起中国史的新体系，成为内藤对于中国史学领域的新贡献。

内藤对中国史分期法的主张，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时期：上古时期，由远古到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内容是继承上古发生的文化，完成了向四方扩展的过程。此时期还可更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中国文化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并进行充实的时期。

后期，中国文化向边境各民族传播，并向东亚发展的时期（而实际上，此前、后二期往往是复杂交错着的）。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的工作宣告完结时，即为上古时期的终结，即至二世纪的汉末时期。

继之，是一个由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期（内藤称它为“中国史上的第一个过渡期”），即由后汉后半叶起，至西晋（316年）止。此时期是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时期。

第二时期：中世时期，由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9世纪初）止。这一时期是边境各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后觉醒起来，其势力反作用于中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的时期。

第二个过渡期：由唐末至五代，为外部势力在中国本部达于顶点的时期。

从内部社会体制来说，内藤认为，中世时期的一大特点是贵族政治（士族，门阀）的兴起，君主也只是贵族阶级的一员。

第三时期：近世时期。内藤认为，中国唐末与北宋之交是“中世”向“近世”变化的转折点，即他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唐宋之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根

本的变化。政治方面，由贵族政治的衰微过渡到君主独裁政治。君主具有超越统治阶级之上的地位。另一重要现象为随着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有一定的提高，平民获得一定的社会自由，通过胥吏阶级，参与一定的地方政事。此因素在中国内部的积累，到清末终于决定中国历史必然走向共和制的前途。这一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国内外历史学界都获得广泛的认同，影响很大。

我个人粗浅体会，内藤的文化史观，特别是他著名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和文化的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思想，以及唐宋变革说，是他的中国史分期理论的二大支柱，影响巨大，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我国的历史学界自共和国建国以来，还是比较注意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述和探讨的，但，恕我斗胆直言，从总体情况看，接受上面权威人士既成理论较多，自下而上独创的较少。而这种情况，又与长期闭锁条件下，很少吸取国外史学界的理论成果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对于与我国历史、文化有特别密切关系的日本，也是如此。譬如，对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的研究，缺乏系统的介绍，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些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一定的好转，但仍有许多空白领域需要我们努力填补。这次，我们把内藤先生关于中国史的代表性著作编译出版，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的朋友，也是这一努力之一。

正因如此，我刚一拟意着手，立即得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先生的再传弟子、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山田伸吾先生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用自己薪金的节余资助本书的出版。对他们的无私援助，谨志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承蒙几位译者在百忙之中，克服相当的困难，承担这些数十年前笔录文章的翻译工作，并且认真

查对，力求准确无误。译者分工如下：夏应元，〈中国上古史〉目录、绪言、第一、十、十一章，〈中国近世史〉目录、第一章，〈清朝衰亡论〉附录2。刘文柱，〈中国上古史〉第二~五章，〈中国近世史〉第二~十六章。徐世虹，〈中国上古史〉第六、七、九章。郑显文，〈中国上古史〉第八章。徐建新，〈中国中古的文化〉。钱婉约，〈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其中有张健译附录1）。对译者的辛勤劳动，谨志诚挚的谢意。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宋镇豪先生审阅了本书上册的部分稿件，匡正错误，并承他为本书出版事宜进行联系，谨致衷心的感谢。最后，还要向热情接受本书出版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科编辑部黄燕生主任，表示谢意。没有她的大力协助，本书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内藤湖南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但毕竟这些论述是发表在距今数十年前，其中涉及的某些史实，今大可能已有更新的研究。另外，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著者对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往往以“蛮夷”“夷狄”相称，使我们感到不习惯；对农民起义称为“盗贼”之类，使我们这些受过“农民战争神圣论”洗礼的人感到“刺眼”。但我们究极的目的是吸收外国史学家的成果，开阔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想，因而对于这些细节，不必过于苛求。故而本书中，对这些地方也一仍其旧，未作改动。

对于本书中，如有编选失当、翻译失实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惠予指正。

夏应元

2002年3月27日夜于东京寓所

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

(摘录)

周一良 遗作

日本文学博士内藤湖南先生以昭和九年(1934)六月二十六日病歿于京都，享年六十有九。先生为彼邦汉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

先生尝自言，早年颇热心于政治……其初期著作乃偏重于论列中国时事。……迨弃新闻记者生活后，始专力于学问。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学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觐焉。盖先生汉文根柢极深湛，复与中国学者罗叔言、王静安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国史学，于资料之蒐集，文义之解读，均无甚困难。而目光之犀利，资料之运用，则多少亦受西洋学风之影响。先生曾谓早年业新闻记者，故涉猎广博，迨晚年专治史学，向所究心者，亦皆足资利用。盖自博返约，先生得之矣。其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论文皆载《研幾小录》、《读史丛录》二书；而史学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亦曾三致意焉。……先生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钱竹汀、章实斋。窃谓先生趣味之博大，成

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乃承受实斋衣钵；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之意欤。……

一良以见闻所限，未能遍读散见之遗著。故仅就先生最精粹之论文结集《研幾小录》、《读史丛录》二书中国史方面论文分类撮取，作为提要，以当介绍。非敢谓先生之成就止于是，姑窥其荦荦大者，且志末学景仰之意云尔。至诸篇结论，自今观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学之途径与态度，则永足为吾人之楷模也。

（下略）（原发表于《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9月）

附注：周一良先生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精通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诸领域。本文是他在燕京大学就读的1934年，亦即内藤先生逝世的同年所写，为我国介绍内藤先生的第一篇文章。但先生生平谨慎自谦，极少张扬。当笔者撰稿中提到此文时，先生极力劝阻，认为是青年时所写，极不成熟，严命我绝不要提及。恩师之命敢不凛遵，是以此文鲜为人知。先生对内藤史学十分推崇。1985年先生应邀赴东京大学讲学，余有幸躬逢其会。时主持其会的池田温教授在演讲会后赠以内藤先生的墨宝，先生十分珍视。回至下榻处后仍再三展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1999年我拟意编译本书时，曾禀明一良师，深得先生之赞许，并慨允为本书撰写序言。惜因先生突然仙逝，以致未竟其稿。惋惜之余，谨选录先生文章之片段，以代序言。（又，文中所提及之罗叔言、王静安、杜君卿、钱竹汀、章实斋，当依次为罗振玉、王国维、杜佑、钱大昕、章学诚）应元谨志。

致中国读者

日本的中国史学，自从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在世界的史学界中，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日本的历史学家们，既具有汉学（中国学）的修养，又熟习近代历史学的方法，因而创造出一些先进的成就，奠定了日本中国史学的基础。在这些前辈大师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学者，当推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

这些前辈大师们所创造的优秀业绩当中，随着经过百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有不少到现在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价值，不为人所注意。但内藤湖南所创立的中国史体系，直到今天仍旧存在，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例如，二次大战后，在日本史学界，就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站在唯物史观立场的学者们，批评京都学派的分期学说，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成为这场争论的起因。经过约二十年争论的结果，对于京都学派持批判态度的一方，由于其学说在理论和史实上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自然失去史学界的支持。与此相反，京都学派的说法，时至今日，仍继续保持其生命力。而创造这一分

期法的鼻祖就是内藤湖南。

不仅日本国内，而且欧美的史学界也十分关注内藤湖南的分期说，把它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他的分期理论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谓唐宋变革说。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成为欧美学术界议论的话题。总之，不论如何，湖南的学说经历了一个世纪，至今仍继续存在于世界的学术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使人惊异之点。而其原因何在呢？

过去站在京都学派对立面的人之所以失去人们的支持，并非意味着唯物史观的误谬，而是由于其理论与史实上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换言之，是由于从外部引入的理论，不能准确地适用于中国史的内容。与此不同，湖南的说法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因而他的理论体系是不可动摇的。

湖南之所以采取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汉学功底。但他又不只是一位汉学大师而已。与此同时，他又是把中国史的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具有近代历史学的观点。可以说，湖南的中国史学是从中国史内部构筑起来的近代历史学。

我认为，今天中国史这一学科最重要的课题是，用中国史内在的理论来说明中国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可是，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工作。即使日本的史学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史的研究也只局限于个别的问题上，具有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我推测，不仅是在日本史学界，即使是中国史学界恐怕也有突破这一局限的必要。如果这

一推测对的话，这一工作恐怕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史学界需要共同合作的事业。

我每逢在研究中遇到困难，就必然要向前辈宗师的业绩中寻找答案。这里所谓前辈宗师，决不仅限于本国的范围。我们日本学者在战后一直把中国尊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也当作我们的导师。陈先生著名的关陇集团说，今天已为日本很多专攻中国史的学生所熟知。如果中国史学界让我从日本史学界中推举一位前辈大师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推举内藤湖南先生。当然，此外值得推荐的学者还很多。例如宫崎市定那样卓越的学者，但他学问的渊源也出之于内藤湖南。

但是，内藤湖南的著作迄今为止向中国史学界介绍的工作还太少。以他的全集多达14卷的庞大数量来比，真可谓不过九牛一毛。这次，由对内藤湖南的学问造诣很深的夏应元教授选编和监译之下，翻译出版了他从上古直到清代的中國通史性论著，比之过去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划时代的大事业。我作为出之于内藤先生学问系统中的一员，我由衷感到喜之不尽。

本书中所收录的内容，全部是内藤湖南在大学讲课的笔记，其翻译工作十分不易。各位译者想必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此谨向夏教授以及各位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内藤湖南一生一贯热爱中国文化。当他六次访问中国之际，曾与严复、刘鹗、文廷式、罗振玉等文人、学者当面交谈，与胡适交换资料。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来日本时，曾与他结下深交。总之，他很喜欢与清末、民国时期的中

国知识界人士交往。现在把他的一部分著作翻译出来，提供给今天中国的学界人士阅读，我想这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谷川道雄 谨识

2002年3月13日于京都

(夏应元 译)

辞退

中国史通论

总 目 录

(上)

中国上古史	1
中国中古的文化	227
中国近世史	313

(下)

清朝史通论	485
清朝衰亡论	663